

壹、緒論

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，不僅重視「品質」的保證與「卓越」的追求，更傾全力以邁向「頂尖」為終極的目標（Cheng, 2009）。而所謂的「頂尖」，除了以華文地區國家、亞洲鄰近國家為競爭對手外，當然還要以世界先進各國為模仿、借鏡、學習與超越的範本，並以「世界大學排名」的高低做為是否達成「頂尖」的績效檢核指標（教育部，2011a）。在前述政策目標之引領下，教育部在2006年至2010年期間共編列了「五年五百億」的經費預算，並以集中式的經費挹注方式，從163所大專院校中擇12所大學及5個研究中心，作為重點栽培對象，以打造出排名居全世界大學前100名的「國際一流大學」（教育部，2008）。就在第一期計畫執行的末了，獲得每年30億最多經費補助的臺灣大學，其世界大學排名在2009年時終於擠進百大之列，教育部宣稱「本階段目標已經達成」，而臺大校長李嗣涔也認為臺大已達成「世界頂尖、華人第一」的階段目標，下一個目標就是「前進全球大學排名前50大」（王維玲，2010；何卓飛，2009）。

然而臺大進入世界大學的百大，似乎未引起社會大眾太多的注意與討論，反倒是學生團體、學界、大學、民間社團及政治人物等發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省與批評聲浪（王明珂，2012；李建興，2012；周祝瑛，2009；陳智華、薛荷玉，2009；彭明輝，2011），雖然面對外界日益高漲的反對與質疑聲音，但是教育部仍然持續提出第二期的五年五百億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，不過不再以「進入百大」為主要目標，而是改採「績效導向」，希望在5年內至少有10個研究中心或領域成為「世界一流」等級，並擇定12所大學共34個研究中心，以延續既有的政策運作模式（教育部，2011a）。

雖然第二期政策目標從「世界百大」轉變成「世界一流」，但是追求「世界級」水準的企圖心仍然不變，而且受補助的12所大學名單也幾乎沒有更動，顯見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與前期計畫之同質性與重複性程度極高，

然而從原有名單中被剔除者，及一直被排拒在外的學校，甚至包括原本即已不認同本政策的各界人士，對於本計畫所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，仍然抱持著強烈抨擊的態度與立場。令人好奇的是，此一政策實施至今已6年，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無法接受，而教育部為什麼仍要執意推出第二期的計畫？難道政府將十年總計一千億的經費花在特定少數的學校，就只是要將這些學校送進「世界百大」或成為「世界一流」而已，還有沒有其他未能言明的目的？至於原本已經處境艱難的弱勢學生，絕大多數就讀的學校皆被排除在名單之外，在家庭資源相對較少、學費負擔相對較高、未來前途充滿不確定感等諸多不利的情況下，又有誰關心這些學生的處遇（王明珂，2012；彭明輝，2011）？

爲了進一步瞭解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，並解答前述的疑問，本研究採取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觀點，並以論述分析的研究方法，深入探討此政策背後潛藏的意識形態及價值預設。傳統政策理論研究取向大多以線性分析模式，探討政策的輸入、過程、產出及背景等因素（吳政達，2003），而後結構主義則運用Derrida（1976）的「解構」與Foucault（1976/1978）的「權力／知識」論點作為論述核心，藉由不斷地「解構」、「建構」、「再解構」、「再建構」等循環反覆過程，以發掘「權力／知識」的形構歷程，從而理解政策為什麼會以如此的形貌呈現出來，及其不爲人知、無法爲人知或刻意隱藏的「真相」，並進而思考在結構制度交織而成的綿密權力網絡下，主體突破結構限制的可能性（李淑菁，2010；翁福元，2007）。

貳、後結構主義理論探討

後結構主義理論從Derrida（1976）的「解構」出發，去拆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現象，再以論述方法去探討看似中立表象下的「權力／知識」共生關係（Foucault，1976/1978），並以Alcoff（1988）所提出的位置性